

## 第一章 前言

### 第一節 起點：觀察與思考

此研究题目的發展源於自己對於女性研究的關注，以及對我的母親的觀察。

自我高中北上求學後，母親在家中的照顧責任減輕許多，因為身體狀況不佳便加入了土風舞班，每天早晨在附近學校集合跳舞運動。回想我仍未離家時母親的生活，雖然有裁縫工作，但因為工作地點在家中不須外出，因此媽媽的生活範圍幾乎都在家中，工作以及照顧家人，平時往來的多是附近鄰居以及住在附近的親戚，交換自種的蔬菜水果和一些生活小資訊。

直到現在，母親還是這個土風舞班的成員，而我發現了母親的轉變，有時回家鄉陪伴媽媽上街時，她可以順道帶我拜訪她的「好友」們，這些同樣是土風舞班成員的媽媽們，總是讓我強烈地感覺她們是和母親有相同生活與生命經驗的女性，從她們的互動中也可以感覺到她們是彼此了解、可以對話的，和過去不同的，母親的生活世界不再只是家庭與附近鄰里，談論的話題也不是侷限於家人與柴米油鹽，母親甚至有機會到社區大學擔任編織老師。

回想全心照顧家人生活作息時期的母親，生活範圍幾乎都在家中，再對照她現在的生活景況，作為一位專職母親或妻子的孤立與寂寞是很明顯的，孤立感來自於實質方面的限制，比如交通工具、金錢的缺乏，或沒有人可以支援照顧與家務工作，因而限制了行動，致使無法與外界接觸溝通，寂寞感也因此應運而生。蘇芊玲在其《母職的實踐》一書中也提及家庭主婦的處境：

她們的辛酸苦楚不是一年一度的頌讚就可以補償的。她們平日生活範圍的狹隘；資訊的缺乏；人際關係的單調；作息的缺少變化；身心疲累的被視為理所當然；空巢期的失落；老年生活的無著；自信心的遞減；生存價值的被忽略；點點滴滴，深深銘刻在母親的身軀與內心裡，吞噬著她們的生命，它們卻變得越來越難表達，或是表達了也無人能懂（蘇芊玲，1998：62）。

孤立與寂寞的女性處境不僅存在鄉村地區的女性，在我的生活周遭（台北），同樣也能觀察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孤立。農曆年前在一次期末聚餐上，一位新婚的學姊在席間鬱鬱地說出，今年第一次不能回新竹自己的家吃除夕團員飯，心中感到非常沮喪，想到結婚當時還信誓旦旦地向母親說，「今年我還是會回來吃年夜飯！」，向公婆提出此要求時卻遭到公婆的不諒解，學姊最後幽幽地說「早知道不要讀這麼多女性主義的東西。」她只是想在家人應該團聚之日也回家團員，這是跳脫了傳統女性角色的思惟，但她人卻仍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啊。幾日之後我向一位年約三十，結婚一年餘，職業為律師的友人提及這件事，她驚呼「原來不是只有我有這種想法！不是只有我覺得痛苦！」過年期間她必須隨著先生南下高雄過年，想到必須與眾多平時沒什麼往來的親戚相處數日，並且每天按照三餐加點心宵夜地清洗所有碗盤，就覺得煩躁難安。去年她隨著先生回老家過年，心想今年該你到我家過年了吧，但終究無法如願。她的驚呼也讓我驚覺，原來婚姻中的女人處境竟是如此孤立，是不敢說還是不知向誰說，職業婦女都如此，更遑論全職母親！

婚姻讓男性繼續保有自己，卻使得女性必須中斷原有的生活、

想法與空間，並且各自孤立一個個的家庭中。

然而孤立之後，我看見母親在參加婦女團體時獲得的友誼對於其成長、獲得支持都有極大的影響，也改變了數十年來單調、完全以家人為中心的生活，這樣的改變如何發生？對這些團體中的成員而言，改變帶給她們的意義是什麼？

##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本研究主要是了解「非都市社區」中「家庭主婦」以參與婦女團體同時在社區中現身，其參與過程的經驗面貌。在此我將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區分為兩個層面，分別為學術研究上的目的，以及個人在研究中期望的獲得。

在社會工作的領域中，婦女為主要的服務案主族群之一，近來女性主義的哲學與原則對實務工作產生影響，發展出以女性為中心的實務工作方法，特別關注女性的生命經驗，本研究對非都市地區的女性自發團體進行研究，除了期望能豐富女性研究的範疇，描繪出在此時代背景脈絡之下女性的生活與生命圖像；此外，對於團體中女性情誼面貌、發展過程以及對個人自我影響的探討，將協助實務工作者發展女性團體工作或對關於社區女性之福利服務時，對於婦女團體的特質與女性的生命經驗有更深刻的認識，以更貼近女性的「主體」需求。

而回到研究者自身的部份，研究對於研究者的意義並不亞於在學術研究上，有時可能更甚於後者。當我們在學術的殿堂中吸取許多理論知識之後，實際深入社會情境進行研究往往才是真正的自我學習

的開始。與母親同樣身為女性，以及對於女性研究的興趣，我的研究從母親出發，也期望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能夠與她分享，然而在學術的路上愈前進的同時，卻也發現我與母親似乎已經失去了「分享」知識的平台。知識理論中強調的邏輯思考、艱澀的專有用語等，都是母親完全不熟悉的，而母親在生活中因為女性集結的經驗所帶來的轉變過程卻是我所陌生的，失去連結母女之間知識共享平台的過程，是否就是實證傳統與女性主義所強調女性認識論之間的鴻溝？在這樣的思考之下，我期待藉由研究的進行，能拉近我與母親之間的認識差距。

綜上，本研究從研究者的母親所在的女性團體為研究場域，參與其中的成員多為五十至六十歲的家庭主婦，這些女性處於男主女主的刻板性別分工架構之下，在子女長成離家之後參與土風舞班，漸漸走出家庭私領域與其他的女性連結。從初步的現象觀察中理出以下二個問題脈絡，試圖從研究中獲得進一步的理解與發現：

(1) 在「個人」的脈絡，婦女跨出家庭的過程是什麼：

從女性生命的觀點，試圖描繪出非都市地區家庭主婦的生命與生活圖像，並且呈現婦女參與團體前後的自我與生活變遷。此外，女人從各自孤立的家庭處境中出走，在團體中獲取與他人連結的機會，彼此之間形成的情誼在女人的經驗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2) 在「社區」的脈絡，自發性婦女團體為自己在社區中取得的位置為何：

對於家庭主婦而言，社區往往是一個陌生、模糊的意象，過去在國家政策主導之下的女性社區參與是以國家、父權為考量，女性的主體性難以顯現，而當女性藉由自發性團體的形式在社區中現身，女性與社

區的關係又呈現何種面貌，能否與外在環境中的婦女運動或社區發展接軌，更進一步發揮力量？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 一、從「女性主義觀點認識論」出發

傳統科學存在性別歧視與男性中心的預設及信念，因而扭曲誤讀了女性的生命經驗，196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學者開始從認識論的角度，對於所謂「客觀性規範」——也就是對於普遍性真理與原則的追求與主張，並且相信奠基在理性基礎上的科學方法是發現真理的唯一道路，提出強烈的批判。

Sandra Harding(1991)整合先前女性主義者的觀點，提出女性主義觀點的認識論(Feminism Standpoint Epistemology)，立場論者認為知識是植基於經驗的，任何知識都是社會情境的產物，是建立在具體的、特定的歷史與群體的生活經驗基礎上，傳統男性中心觀點將女性視為研究客體必須被挑戰。女人間不同的生命經驗在科學研究中一開始就被錯誤地貶低與忽視，或被認為是常識，而非知識，因此立場論者認為應該以被忽略和貶抑的女性或是被壓迫者的生活經驗作為知識發展的依據。

女性主義觀點認識論凸顯了女性經驗的意義與價值，「女人的觀點來自日常生活」(Harding,1991)，因此關於女性的研究應該從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開始，本研究據此採質性研究方法，貼近女人的立場(standpoint of women)，試圖重新刻畫女人的歷史，使一代代女性的面貌逐漸清晰起來。

## 二、研究對象的選擇與背景介紹

### （一）研究對象的選擇

以土風舞班為研究田野，在其中選擇參與時間超過十年的成員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訪談，希望了解非都市地區家庭主婦參與社區的歷程。在此是以廣義的方式界定「婦女社區參與」，當婦女跨出家庭的門檻參與家庭以外的活動，即視為是社區參與。媽媽土風舞班之成員參與土風舞班是家庭主婦在社區中現身的一種方式，而媽媽土風舞班的團體形式是提供婦女一個從家庭出走與他人連結互動的重要管道。以研究者母親所在的團體為研究場域，希望藉由研究了解母親的生命經驗，同時為避免與母親過於親近的關係而可能產生的偏頗，在研究中未將母親列入深度訪談的對象，而以觀察的方式了解其經驗。

### （二）研究場域背景簡介：媽媽土風舞班走過近二十年歲月

清晨六點在偌大的縣立體育場上，十幾位媽媽在晨曦中聚在操場一隅，在清揚的樂音中擺動身體，舞曲歇息的空檔，媽媽們話家常、談笑聲填補了空檔，當下一首舞曲聲響起，大家又隨著手舞足蹈起來，一首舞曲約三至四分鐘，每週二、四、六早晨媽媽們聚在此一個小時的時間可以跳上十幾首…（筆者描述土風舞班早晨聚會的情景）。

土風舞活動在台灣發展最早開始於 40 年代由「救國團」引進，1957 年邀請美國人士來台教授土風舞，第一波培訓的種子教師有 123 位國小教師，接著救國團繼續將土風舞應用在康輔活動中。1977 年政府以「教育部」為主導單位推展全民運動，土風舞為其中之一項運動，

隔年教育部即連續開辦土風舞指導員研習會，以培訓各地的指導人才，並編訂統一教材供全國使用，至此土風舞活動在台灣為其全盛時期，不僅由學校系統走入社區，同時由都市深入鄉村地區。

由陳老師所帶領的媽媽土風舞班從成立以來已經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最早土風舞這項活動在台中縣鄉鎮的推展是在救國團體系之下，土風舞的內容豐富，當時主要分為團康及創作兩個主要的流派，舞步的編排取材範圍廣泛，包括歐美、義大利、日本及本國原住民的舞蹈，以及標準舞如華爾滋、吉魯巴、探戈，甚至現下青少年的街舞等，均可納入創作的題材。土風舞興起以來，號召參加的以女性居大多數，陳老師因為本身興趣濃厚，在定期的練習時間以外，私下帶領一些跟不上進度的成員練習，漸漸發展成一個固定的團體。

土風舞班的成員多為家庭主婦，因為家庭因素必須中斷練習的情形所在多有，因此團體非常具有開放性，成員的加入與退出具有彈性。團體成員目前有 12 位，均為女性，平均年齡 55 歲。土風舞班除了現在每週固定三天（星期二、四、六）的晨間聚會練習之外，在當地政府單位或社區活動中也極為活躍，包括鎮運動會、今年年初的鎮公所落成典禮、學校運動會及農會產品展售會上，都可以見到成員們在舞台上表演的身影。

### 三、研究設計

為實際貼近女性的生命經驗，賦予其更大的發聲空間，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進行，以媽媽土風舞班的成員為研究對象進行觀察與分析研究。

## （一）資料搜集

1. 觀察並撰寫田野日記：在研究開始前，研究者首先進行一段時間消極性的觀察，也就是與團體成員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不直接進入研究程序，以獲取研究對象的信任，並且降低研究者的出現對團體例行事件的影響。Carspecken(1996)認為霍桑效應(Hawthorn effect)在質性研究中難以避免，但並不會對質性研究帶來傷害，因為在質性研究的分析階段重視的是行動的條件，也就是文化、規範、價值、信仰等範疇，霍桑效應所指涉的研究者出現導致研究對象的行為改變，是屬於較淺層的範疇，並不會深入到與文化環境相關連的行為。然而盡量降低研究者對研究場域的影響對於研究進行仍是必須的，助於提高研究的有效性，因此首先進行消極性觀察，並且在觀察或與成員交談後撰寫田野日記。觀察的範圍包括團體例行的晨間運動時間與非例行性的成員聚會或外出活動等。
2. 深度訪談：研究者與團體成員建立信任關係之後，進行個人的深度訪談，以獲取主觀性的資料。因團體成員極少有受研究訪談的經驗，為避免情境過於不自然影響表達，研究者盡力尋求未背離成員生活脈絡，並且支持信任與自然的環境下進行訪談，例如在成員聚會時安排不受干擾的場地進行個別訪談；並且從平時的觀察中，了解個別成員的認知方式，習慣使用的辭彙與表達方式，調整訪談的方式與研究者的語言使用，希望能找到女人發言的空間，獲得更豐富的資料。

## （二）資料分析

1. 研究者在撰寫田野日記以及將質性訪談製作逐字稿同時，即隨時

進行低層次的編碼(low-level coding)，也就是詳細讀取所獲取的資料，標示出其中有意義的言語或事件，包括例行的與不尋常的事件。

2. 從編碼中研究者進行意義分析，試著寫出研究者的初步想法與低度推論，以釐清從研究者從觀察或訪談中接受的意義印象。資料分析的過程與資料蒐集的動作將重疊進行，有助於修正研究及資料收集的方向。
3. 最後將從資料編碼中分析並選擇重要有意義的重點撰寫研究發現，並將想法與同儕諮詢者進行討論，檢驗是否帶有研究者偏頗的觀點。

### (三) 研究信實度

運用以下的方式提高研究的有效性與客觀度：

1. 同儕檢證：選擇對於研究題目有興趣並且具備相關背景理論知識的同儕，在研究進行過程中與同儕做討論，以隨時檢查研究者的觀點與論證方向。
2. 參與者檢核：在分析資料的階段，研究者將所作的初步推論與分析與受訪者分享，若有衝突時研究者可以重新思考推論的方向是否偏頗，或將受訪者的看法視為另一種可能。